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演化与多元特征

刘文革 孙瑾¹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显示出中国发展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性，其结构演化与创新需要系统地研究，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模式呈现明显的差异，值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借鉴。在系统评述现有的研究争论基础上，本文阐明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本质和演化逻辑，并围绕构成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维度提炼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中央威权与地方分权模式、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模式、多元要素供给与综合优势模式和渐进式全方位开放经济模式，以此清晰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鲜明特色和独特竞争力，澄清了一些西方学者及各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误判与否定。

关键词：中国发展模式；内生演化；多维模式；独特优势

引言

近年来，一次次经济地震让全世界摇晃不已，震中位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暴露出美式资本主义的弱点，还证明了其自由市场经济宽松监管模式的不足和整个体系的周期性危机倾向。面对冲击，中国在持续 30 余年经济增长基础上仍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一枝独秀，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否表明中国已走出一条与西方经典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不同而又具有普世价值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否有独特优势？未来将怎样调整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以保持其生命力？很好地回答该问题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三个自信的关键所在。

除了现实层面，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层面，国内外学者仍然存在大量争论。尤其是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官员和学者近来指责中国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指出中国支持国有企业垄断资源，挤压外资发展空间，阻碍了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并在全球争夺资源²；而国内学术界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投资。面对

¹【基金项目】：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和独特竞争力研究”（13BGJ004）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本加入 TPP 后的东亚生产网络：中国的地位与合作空间”（14CGJ020）基金资助。

²参见：“别拿‘国家资本主义’和中国说事”，《人民日报》，2012年4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27/c_111850787.htm，2014年1月5日。

争论，如果不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入的总结和提炼，那么中国发展道路将会遭受更多的诟病，西方观点的陷阱与国内学者的困惑仍将持续。

目前国内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都是从某一方面切入得出结论，从而对现有问题的分析缺乏系统性。例如有的学者从地方分权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在肯定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时，也对这一分权模式的弊病进行批评，甚至判断现在由于面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就得出中国经济发展危险的结论（张五常，2009³；许成刚，2014⁴）。有的学者从发展战略——要素禀赋结构角度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及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⁵。相对系统性阐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特性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的是复旦大学史正富教授，他将中国的市场经济概况为“三维市场体制”，即建立了包含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竞争性企业系统的市场体制，不过这种归纳是静态的总结，尚缺少中国形成独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演化的动态分析⁶。

基于此，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演化与创新定位进行系统性动态研究，全面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特征及其逻辑演化和逻辑关系，这有助于减少国内学者及各界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制度的理解偏差，以及澄清一些西方学者及各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误判，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现有研究争论与文献综述

对于中国的崛起的研究，往往要联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国内外学者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引发了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场大争论。总结来看，针对此问题国外已有研究形成了三大理论派别，而国内学者还停留在是否存在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一判断上的困惑，并缺少对其维度特征与独特竞争力的清晰与深入理解。

（一）国外学者三大派别的争论

第一派别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实现繁荣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并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正因为中国过去走了

³张五常：《保零也艰难》，2008年10月24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bbqo.html，2014年11月16日。

⁴许成刚：《中国经济最危险之处是地方债》，2014年10月5日，<http://finance.sina.com.cn/zt/china/20141005/135120469787.shtml>，2014年11月16日。

⁵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173页；

以及林毅夫、苏剑：《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

⁶参见史正富：《超常增长：194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35-36页。

“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发展道路，而中国改革存在的问题则在于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国际化的程度不够⁷。代表人物之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认为：市场化和私有化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而西方学界对于中国过去十年国进民退的看法并没有实际依据，在更多领域消除垄断才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出路⁸。

第二派别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与西方模式不同，中国走的是独特的发展道路，并引领新兴经济体走一条新路。代表人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其灵感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政府和市场力量的相互参合⁹。在批判“华盛顿共识”的“后华盛顿共识”基础上，他主张不同的经济可能需要不同的制度，强调政府干预市场的必要性，尤其在经济转型期间政府控制经济能力方面的作用¹⁰。他指出，通过巨大的国有部门发挥中国经济杠杆作用，中国经济通过了金融危机的检验，和日本、亚洲四小龙相比显现出相当的防御能力，具有其特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甚至，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在于“市场（力量）过多，政府（力量）太少”，并告诫中国不要走美国发展模式的老路，那是一条充满灾难的路¹¹。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识”¹²概念也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虽然北京共识没有完全概况中国改革的经验和过程，但是其概括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与西方的独特特征。¹³

第三种派别实用主义的观点，即执行实用主义模式（折中主义），该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几乎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只注重结果，其模式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人们都在寻找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直接采用现有的模式相比，探索过程的本身更加重要¹⁴。其代表学者还有美国赵穗生教授，他指出：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模式，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非意识形态的、务实的、试验性质的改革道路，并强调经济成长

⁷Fareed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published by W.W. Norton & Company, May 2009

⁸Nicholas R. Lardy, *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 Sector Business in China*, published b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S., Sep. 15, 2014.

⁹Stiglitz, J.E, "Capitalist Fools", *Vanity Fair*, January 2009

¹⁰Stiglitz, J.E,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1998 WIDER Annual Lecture, Helsinki, January 1998, reprinted Chapter 1 in the *Rebel Within*, Ha-Joon Chang(ed.), London: Wimbledon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p.17-56.

¹¹Stiglitz, J.E, *Reforming China's State-Market Balance*, ProjectSyndicate, APR 2, 2014.

¹²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fpc.org.uk>.

¹³Scott Kennedy, *The Myth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une 2010, pp461-477

¹⁴参见：Moyo, Dambisa. *Winner Take All: China's Race for Resource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ISBN 0-465-02828-4. 2012

和政治稳定的政策¹⁵；新加坡的郑永年教授，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也很好阐释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实用主义模式这一派观点¹⁶。

从国外这三种派别的观点来看，第一种派别不承认“中国模式”，后两种派别承认中国在发展模式上的独特性和探索性，但是却不能完全概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科学内涵及演变趋势。

（二）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 30 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中国学者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两个方面：

第一，是否存在独特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此，以张宇、程恩富等为代表持肯定观点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的科学概括。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思考、反复探索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是不可能否认它的客观存在的。而以田国强、姚洋等人为代表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没有创造一个新模式，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人可能把目标和过程混在一起了，因此，我们还不能认为已经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¹⁷。

第二，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和特征的理解。与国外新自由主义观点相一致，也有一些国内学者提出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其中典型代表是朱嘉明等¹⁸，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在市场 and 私营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残余计划经济制度和发育不良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金融垄断；第二，政府控制资本市场；第三，国家对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三大领域的垄断。麻省理工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黄亚生 2008 年在国外出版一部有影响的著作：《中国特色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书中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从 90 年代开始，中国开始转向有利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城市企业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¹⁹此外，还有以田国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一个翻版，中国从改革目标、内容等方面还是遵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国和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没有多大

¹⁵S. Philip Hsu, Yu-Shan Wu, Suisheng Zhao,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ug. 2011

¹⁶参见（新加坡）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前言第 3 页。

¹⁷具体概况参见：刘文革等：《关于‘中国模式’研究观点述评》，《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 年 10 月。

¹⁸朱嘉明，陈宜中：《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2012 年 11 月 9 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8943.html>，2014 年 1 月 5 日。

¹⁹黄亚生此书受到了中国国内与国际学术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还被《经济学家》杂志评为年度佳作。

独特性；而以吴敬琏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则认为，中国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通过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建立新体制的基础设施、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加速社会转型。²⁰。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两大对立观点，一是赞同观点；二是不赞同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已经走出一条和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具有一定的普适价值，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而到达更优的目标；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模式无非是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内容（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才取得了经济增长的绩效，未来还应当进一步走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之路。两大对立的观点都暗含着将中国发展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对比研究，但由于缺乏系统性，因而无法揭示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独特竞争力和生命力。本文结合大量已有国内外研究文献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演化与创新定位进行系统性动态研究概况，全面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特征及其逻辑演化和逻辑关系，更加清晰概况出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及其丰富的内涵。

二、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及独特演化路径

中国有自己的独特经济发展目标模式，那就是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一宏伟的目标模式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首次提出，其后其理论体系不断创新和丰富。在实践上，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探索，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结构和运行框架。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论断，表明未来将通过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基本模式。“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是中国发展模式的资源配置方式规定。两者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国独特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源于规则内生性的制度变迁方式，这一基本的“制度模式”使中国在改革中既保持了原有的“宪法秩序”，又使得市场规则和内容不断“内生”演化，随着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快速增长。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实践中，由政府控制改革节奏和内容，并以追求经济发展为目标，其作用是促进市场化经济所需的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创新，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化秩序，并且弥补市场失灵，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人为理想建构的结果，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过程，即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对发达经济体的

²⁰吴敬琏，《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5期。

市场经济模式进行仿效和预先设计，而是一个市场规则不断“内生”、政府相机抉择的结果²¹。

突破原来低效率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与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转型经济体不同，中国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这是根本的宪法秩序约束，在这一约束条件下，中国的市场化经济改革路径，有两个最显著的独特性，一是坚持公有制度的主体地位，二是具有渐进性和内生性。

就第一个独特性来讲，由于保持和强调公有经济主体地位，使中国在改革进程中私有制经济不断发育、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形成独特的国有企业制度和各种独特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形态，通过“抓大放小”的改革，国有企业规模在不断缩小，但是控制力在不断增强，并且由强调保持企业的控制力到现在强调资本的控制力等。²²

这里强调的是，改革前期，为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集中于内部管理体制，这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间保留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存量”，虽然效率相对低但在创造产出，这为其他非国有经济部门带来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产品需求，进而使得其他非国有经济形式获得了快速发展。随着效率相对高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不得不进行产权关系变革，因此，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是随着市场环境变化而不断深化的，而其他非国有企业则是在“边缘上兴起”²³，进而不断演化、发展壮大，并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育。由此可见，国有和非国有企业，这两类经济主体即有竞争关系，同时又有依存关系，都在最求效率和发展，最终根据“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国有企业逐渐在竞争领域推出，规模不断缩小，非国有经济成无论在经济增长贡献和就业方面都为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由此，中国则形成了“国企+民营”独有的互补性的共生形态，对于这种共生形态，国际权威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²⁴：中国生产效率高的民营企业有较高的储蓄和稳定的融资渠道（民企内部融资），而生产效率低的国企容易贷款，利用低成本信贷维持其投资（国企外部融资），中国整体的资本回报率一直增加，积累了大量资本。于是在中国，生产效率高的私企集中在劳动密

²¹详细论述参见刘文革：《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版。

²²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进一步提出“保持国有资产的控制力”的目标。

²³科斯称之为“边缘革命”，参见（英）Ronald H. Coase、王宁著，徐尧、李哲民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 1 月版，第 70 页。

²⁴Zheng Song, Kjetil Storesletten, and Fabrizio Zilibotti, “Grow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2011, pp.202-241

集型行业，而国企掌控资本密集型行业，这是中国经济转型下的高产出增长、持续的资本积累、制造业部门再分配和巨额国际收支顺差的独特优势。²⁵。

就第二个独特性来讲，尽管从市场化改革的最终结果来看，中国市场化的内容和其他转型经济体有“趋同”之处，但中国的市场经济由于有了公有制这一基本约束，就必须探索前进，因为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无论是理论和实践都无可借鉴之处。而探索前进，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的市场发育是有先后次序和节奏的：就市场体系的形成来讲，先是商品市场的改革和发育、再是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两种市场又都经历“双轨制”²⁶；就国企改革来讲，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承包制到股份制、直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对外开放来讲，我们先是经常项目开放，后资本项目的开放，先沿海后内陆等。这种先易后难，增量改革，实验性的改革方式具有成本低、可逆和纠错能力强等独特性，并逐渐寻找和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的制度结构，从而也能避免了经济产生大的震荡和国际因素的冲击，而拉美、俄罗斯、东亚国家过早开放汇率和资本项目带来的教训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我国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至今没有完全开放，使得我们能有效抵制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并以上海自贸区为试验田，逐步扩展到广东、天津和福建，再建三个自由贸易区试点，继续我国增量性、实验性的改革方式。随着上海等自贸区的建立与试验，这些有待开放的领域将逐步进行。这种渐进的、有次序的市场化实质是一种规则内生性的改革方式，新的规则随经济体的“需要”而不断发育和产生。这也同时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照搬“华盛顿共识”、重蹈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覆辙和避免了像俄罗斯那样出现“大国转型灾难”的原因²⁷。

如前所述，面对中国的崛起，一些争议亟待厘清。西方学者争相指责中国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质，指出中国支持国有企业垄断资源，挤压外资发展空间，阻碍了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其本质区别在于我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我国始终强调公有制主导地位的实现方式²⁸。中国虽然主张利用外国的和本国的资本主义，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技

²⁵JustinYifu, L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The World Bank publication, January, 2012.

²⁶要素市场双轨制正在改革进行中。

²⁷著名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在评价俄罗斯激进改革时写道：“我们在思考转型经济或发展中经济的时候，往往把这些制度（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如果转型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他还强调了制度之间的互补关系。参见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6页。

²⁸参见中国《宪法》的规定。

术、管理经验，但是它从来都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相反只是把它当作“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主体是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²⁹。可以说，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独特，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待资本主义，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³⁰。中国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是“社会主义”，和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别³¹。

发达国家之前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现在又认定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质是中心国家反对外围国家崛起，想让后者重走新自由主义道路，以利中心国家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当他们发现其目的无法实现时，为了重建其全球治理的主导权，他们正另辟蹊径，试图建立新的 WTO，如由美欧日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事实上在发达经济体间形成了新的“神圣同盟”³²。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建立上海自贸区与发展区域贸易协定具有战略性意义。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游戏规则中，坚持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抵抗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不断探索新的改革内容、不断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争取有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三、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特征

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有其独特演化路径并带来中国经济增长，或者说中国经济增长内生于这一独特发展模式。但为什么国内外对中国独特发展模式存在较大的理解偏差？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外大多学者从其价值取向和研究偏好，倾向于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某一或某些维度特征，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丰富内容和结构特征缺乏全面的理解，本文在国内外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研究文献基础上，基于构成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的多维角度，围绕其基本规定，从五个维度进行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其特征，对其独特发展模式所具备的各个特点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系统阐释，同时也指出其不足。

（一）在所有制和调节资源配置方面形成混合经济模式

20 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两个极端都不成功，而“混合经济模式”却表现出生命力，但大多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始终没

²⁹胡乐明等：《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发展模式”》，《经济研究》2009 年 11 期。

³⁰威尔·赫顿：《伟大的中国商城》，英国卫报 2004 年 5 月 9 日。

³¹王浩：《“国家资本主义”再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研究》2013 年第 3 期。

³²李阳：《全球经济危机的长期化及中国面临的挑战》，第十三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主报告，2013 年 9 月 21 日。

有形成一个堪称“经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经过 30 余年改革开放探索和实践，中国在所有制和调节资源配置方式方面形成了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

所谓的中国经济是“混合经济模式”，总的来讲，指的是即政府和市场力量共同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和作用。市场机制是经济合理配置资源、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基础。政府参与资源配置方面，在中国转型经济特殊背景下，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它和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和三重经济转型过程紧密契合，使中国经济向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三重转型过程中，带来资源配置效率、工业结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据统计，从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到 90 年代早期，与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阶段相比，全要素即 TFP 的增长可以解释中国在 1978-1995 年间的增长的 30%-58%³³。在这一进程中，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力量能在很大程度上互补共同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政府在弥补市场功能不足以及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创造了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在这一维度上如何体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呢？混合经济的基础是所有制形式的混合。在中国，始终坚持和强调公有制占主体的制度结构基础，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的各种形式。在宪法修订中明确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同的经济地位，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所有制结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2013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加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践中，“混合所有制经济”还侧重和强调所有权的“混合”，即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经济形式，它的作用在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我国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创新及其循序渐进的发展和深化过程充分表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能更好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实践来看，混合所有制结构已经创造了国民共进的双赢效果。一个实证结果显示：截至 2012 年，中国三次产业经营性总资产约为 487.53 万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的资产规模是 258.39 万亿元，占 53%；第二、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占增加值和就业规模的比重分别为 67.59% 和 75.20%。这表明公有制资产仍占主体，而非公有制经济贡献占优。³⁴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转型下的高产出增长、持续的资本积累、制造业部门再分配和巨额国际收支顺差的独特优势。³⁵

³³World Bank,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7.

³⁴裴长洪：《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

³⁵Justin Yifu, L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The World Bank publication, January, 2012.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运行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并指责政府对经济过多投资，特别是对2009年的四万亿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刺激经济的政策。理论界有诸多批评意见，如吴敬琏的腐败寻租观³⁶、郎咸平的闲置观³⁷和张维迎的重复建设观³⁸。不可否认，政府投资却有负面作用，但我们不认同“政府主导型”这一提法。因为这种提法把资源配置中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力量完全对立起来，似乎是政府力量抑制和替代了市场功能。其实政府投资，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和其它公共产品方面的投资，对市场发育有着重要意义。根据斯密定理，分工和专业化是一国经济增长源泉，而分工和专业化的提高，又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一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正是有扩大市场范围的作用。由于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不能自发协调解决外部性问题，靠市场中的企业自来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就会不足。³⁹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就会提高效率，满足经济需要。一些比较充分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值达到0.05—0.07，表明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⁴⁰，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省际之间的贸易增加⁴¹。中国铁路客运交通能显著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使厂商通过劳动密集生产技术减少中间品和资本投入；公路客运交通能产生规模效应促进要素投入。⁴²由此可见，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短期刺激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市场发育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这一点来讲，中国对基础设施和其它公共产品的投资是对市场功能的扶持和促进，而不是对市场功能的抑制和替代，即政府和市场力量共同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因此，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概括缺乏科学性。此外，中国政府不是扶持性政府，这和东亚模式是有差别的，而是偏向市场化的主体，运用政治企业家模式有竞争有开放。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市场化行为：掌握国有资产、金融资产等国有企业的经营，具有未来预见性，并构成超级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化的政府多了一个经营主体必然带来经济增长，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不过，如上所述，我们对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还没有完全厘清，特别是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政府对生产要素的定价和流向，有较强的干预，由此带来了生产要素配置的扭曲，继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如效率低下、腐败等问题。在一

³⁶吴敬琏：《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河北学刊》2004年7月。

³⁷郎咸平：《关注藏富于民的政策信号》，《中国航天报》2009年1月6日。

³⁸张维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经济研究》1998年第7期。

³⁹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要义》，《企业家日报》2013年9月21日。

⁴⁰张学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⁴¹刘生龙、胡鞍钢：《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研究》2011年第3期。

⁴²张光南、宋冉：《中国交通对“中国制造”的要素投入影响研究》，《经济研究》2013年第7期。

些行业和领域政府存在过度监管，如行政审批，还有监管不足问题，如生产安全、食品安全领域等，这说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边界还没有确定。

（二）在区域经济关系方面形成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模式

“中国式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⁴³观点主要是指中国分散化的财政体制，由钱颖一等学者较早提出。之后，许成钢等经济学家将中国的政治集中和经济分权结合在一起，强调了中国与俄罗斯等国政治体制的不同激励。⁴⁴中国在区域经济关系方面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分权模式”，并进一步形成区域竞争格局，促进了市场化发展。⁴⁵而根据我们的观察，除地方分权特征外，中央政府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围绕这一目标，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人事领域对国家治理高度控制，这里称之为“集权治理”。这使得中国形成了中央集权与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模式。它既实现了中央政府的政府的战略目标，又极大调动了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使社会资源得到了较为合理的配置与利用，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在这一维度上如何体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呢？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约束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决定了中国体制既不同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民主治理结构也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国家治理结构，而是保持既有民主又有决策效率的中央政治集权的组织治理结构，且任命制避免了民主制下服从党派利益却脱离了国家利益的弊端。而地方分权的积极意义在于向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激励，这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分散的财政体制下，由于市场要素流动下政府竞争增加了政府援助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地方政府不再有激励向经营绩效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援助，结果是所谓“市场维持型联邦主义”的确立，这也是 Qian 和 Weingast 提出的“保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效率的一个解释⁴⁶。这种体制的核心运行机制是地方竞争和地方试验，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相比俄罗斯的地方分权制，如州长由选民选出，并有较大自治权而形成的“市场掠夺型联邦主义”，更突出中国式集权和分权的特殊意义⁴⁷。

⁴³Montinola, Gabriella, Yingyi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5,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Oct.,48(1), pp. 50-81.

⁴⁴Qian, Yingyi, Gerard Roland, ChenggangXu, 1999, “Why is China Different from Eastern Europe? Perspective from Organization Theo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 April, 43, pp.1085-1094.

⁴⁵ChenggangXu,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4, pp1076-1151

⁴⁶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1, No. 4, pp. 83-92.

⁴⁷俄罗斯 2004 年取消了州长选举制，并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权力，2014 年开始进行“地方投资环境排名”，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进行积极招商引资的一个考核指标，目前已经完成 21 个联邦主体的排名，参见普京在 2014 年 5 月 22 日第 8 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演讲报告，俄罗斯正在学习中国的“分权激励”，《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db.cssn.cn/sjxz/>，2014 年 6 月 3 日。

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中国集权和地方分权是中国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的渐进道路的一个表征。回顾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放权让利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财政分权”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极大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中国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形成企业式的竞争模式推动了市场化的进程，在省、市、县级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和升迁激励机制作用下，地方政府竞争加剧，地方为发展经济，大力招商引资，各地区利用实际外资金额大幅增加。地方政府之间“招商引资”的标尺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⁴⁸。地方政府实际上参与到企业发展的引导激励、土地投入以及支持服务等具体方面，因此政府从企业取得的财政收入中就有一部分不再是“税”，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租”，可以说，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我国产权制度变革和市场化的主要动力，民营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进程是地方政府在产品市场展开竞争的结果⁴⁹。樊纲等（2003）测算了地方政府市场化指数⁵⁰，数据显示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市场化指数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表明地方政府的市场化水平都显著提高，虽然地方政府之间仍有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在各地方政府的激励竞争中在逐步地缩小。在地方政府竞争态势下，地方政府会追求更高的 GDP 增长，从而推动全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尽管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形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地方政府在鼓励投资、增加资本并产生就业机会的同时，带来了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拉大了地区间贫富差距，内生于这种分权激励结构的相对绩效评估又造成了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⁵¹也有学者发现财政分权虽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却恶化了各级政府在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投入，反而导致居民福利下降⁵²。

（三）在经济结构方面形成了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很快，形成了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模式。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能够提高市场化程度并推动经济增长⁵³，工业化是市场空间持续拓展的过程，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品市场持续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过程，也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不断提升的过程。⁵⁴而在城镇化过程

⁴⁸张军等，《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 年 3 月。

⁴⁹张维迎，栗树和：《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1998 年第 12 期。

⁵⁰樊纲、王小鲁、张立文、朱恒鹏：《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研究》2003 年第 3 期。

⁵¹王永钦等，《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2007 年第 1 期。

⁵²参见尹恒，朱虹：《县级财政的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 期。

⁵³ Jones, C.I. and P. M. Romer, "The New Kaldor Facts: Ideas, Institutions, Pop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094, June 2009.

⁵⁴《比较》编辑室：《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之路》，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年 10 月，第 29 页

中，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聚集，扩大了市场规模，深化了社会分工，市场力量又引导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聚集，两者产生了累计效应。这种中国特色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具有抑制经济繁荣时成本上升的内在能力，能够提供企业持续投资的意愿和强度，使得中国经济具有持续超强的增长动力。⁵⁵

在这一维度上如何体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特性呢？这一模式的形成主要是国家推行的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但其快速的发展态势则有赖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中国自建国以来实行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公有产权制度。以此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发展，实行城市土地“补偿征地”制度，农村集体土地“低价收购”制度。把补偿或低价获得的土地出售给开发商，建商品房，政府获得大量土地出让资金（这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而建设用地则低价用来招商引资或以此作抵押向银行融资，盘活土地资源，以此来推动工业聚集和城市的发展。这其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基于非私有土地产权制度的政府拆迁征地的交易成本“极低”（包括补偿的成本），使得总体土地使用权的转换和依效率原则的土地资源配置更加迅速，使中国形成了赶超型工业化，并抓住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时机，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虽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相对于工业化进程仍然较为滞后，但未来中国城镇化还将保持较快发展趋势并不断推进，预计 2020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60%左右。⁵⁶

除了独特的公有土地制度，中国工业化还有一个特殊性在于以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由于起步晚赶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信息化时代，可以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这种融合水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中国人均地区实际生产总值可增长 0.06%，并且融合可促使第一产业向第二或第三产业转移。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⁵⁷道路就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道路，提出要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将成熟的高新技术应用到传统工业中去，缩短工业化的时间周期。这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工业化阶段不一样，它强调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走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道路。

目前中国的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模式也相应地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政府补偿征地和低价收购制度扭曲了土地与房地产市场，并且大量由土地抵押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成为隐患；另一方面，目前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没有达到最优水平，⁵⁸并且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质量不高，还引发了生态资源环境破坏等一

⁵⁵史正富：《超常增长：1949-2049 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5 月版，第 150 页。

⁵⁶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⁵⁷2002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新型工业化定义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⁵⁸谢康等：《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质量：理论与实证》，《经济研究》2012 年第 1 期。

系列问题，有学者提出中国“低价工业化增长模式”⁵⁹、“低价竞争模式”⁶⁰等问题，这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地区经济增长、降低能耗等有不同程度的影响⁶¹。

（四）在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方面形成了多元要素供给与综合优势模式

林毅夫等学者借鉴了国际贸易学要素禀赋等相关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经济奇迹，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逆比较优势”的要素扭曲型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通过市场的矫正实行了“顺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⁶²。而今，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不断发展和积累，中国已形成了“多元要素供给与综合优势模式”，即形成了全面的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产业层面的要素供给优势，这些要素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带来的高级的知识、先进管理、高端制造技术等生产要素相结合，又形成了产品价值链层面的要素综合优势⁶³。目前，中国已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产品供应链系统，并具有了强大的集成创新能力就是这一优势的体现。这些由先天性禀赋、创造性禀赋和人为性因素所带来的优势，既是发展的成果又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取得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坚实基础。

首先，众所周知中国人口众多，具有充裕而低成本的劳动力禀赋，这是和很多亚非国家一样的先天性禀赋。但是工业化早期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并不具备资本优势，中国采用逆比较优势战略，即人为压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价格，包括采用农产品剪刀差，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来支持工业产品的生产。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不断被释放，将逆比较优势成功转化为顺比较优势，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消除了要素短缺和扭曲现象，而且创造性积累起来了充裕的资本禀赋。

其次，中国的土地要素价格与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以及地方分权模式密切相关，一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程度越高，则土地原始增值的幅度就越大。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使得工业用地的成本低廉，这就为工业生产创造了土地要素供给优势。除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在技术方面，持续多年的教育、研发投入，除高端技术如信息和高端制造技术以外，在中等科技及一些新兴战略性产业中，中国正日益成为强有力的技术领先国家。前面多次提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衡量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

⁵⁹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⁶⁰刘世锦：《增长模式转型压力与战略选择》，《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9期。

⁶¹谢康等：《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质量：理论与实证》，《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⁶²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年，第195-197页。

⁶³这里综合竞争优势是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全面、多种要素供给相对丰裕，且没有明显的要素短板，它有利于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供应链系统，进而形成经济发展的综合优势。

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中，知识和体制变革的影响非常大，这是理解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一大特点⁶⁴。除此之外，中国政府人为压低自然环境资源价格甚至不考虑环境污染成本而产生的供给优势，虽然不利于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是却也是带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

在这一维度上如何体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呢？总结来看主要表现在中国增长的动力来源不同于其他国家，不是仅靠单一的生产要素供给优势拉动经济增长，而是形成了有利于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的“多元要素供给优势”（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等），这一优势，成为驱动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不仅如此，通过扩大开放和招商引资活动，外国的先进生产要素不断引入，和本国生产要素结合，形成了门类齐全，完整的工业体系、供应链体系，提升了集合创新能力，具有了要素综合优势，它对内拉动经济增长对外则形成了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

但是，我们在高端制造业、知识密集型产业、信息、金融服务业等领域技术创新仍然不足，出口粗放型增长，尤其是在价值链生产环节中处于中低端水平，出口国内增加值偏低，这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反映出中国在人力资本、高端技术及原创性创新方面的不足。

（五）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形成渐进式全方位开放经济模式

在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中，90年代全面的开放经济使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的机遇，中国在前一时期积累的基础上，及时加快经济改革，非国有经济和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发展，带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提升，大力发展出口导向战略，以迎接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后发优势，达到比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和结构转型速度。中国正是在不断扩大开放政策推动下，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地吸纳了美欧等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提供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迈入新世纪后，中国加入WTO，由此推动的国内改革加大了企业的竞争压力，加快了技术引进和追赶的步伐，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全球制造业中心和贸易大国。目前中国正在形成和向全方位开放战略的转变的态势，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416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中国不仅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且逐渐成为世界市场，对外净投资国。

在这一维度上如何体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呢？迄今为止，中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开放，这和我们独特的开放模式有关，中国是有次序、有

⁶⁴郑京海、胡鞍钢、Arne Bigsten, 《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一个生产率视角》，《经济学（季刊）》2008年4月。

节奏的全方位开放。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的是，正是对外经济的渐进式开放使我们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和影响。而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大多是激进式开放，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对其资本流动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其在每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都受到了严重冲击。中国采取经常项目全部开放、而资本项目和服务业渐进开放，汇率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原因就在于，由于市场化的制度基础不完善，如果过早开放资本项目后，导致金融脆弱性的增加，易受国际市场动荡的冲击；同时，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的收益要少于发达国家，因为其不发达的国内金融体系下，开放资本项目未必能促进本国投资的增加，也难以将本国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投资。⁶⁵中国的开放经济模式符合新结构经济学中归纳的渐进法方式，在转型过程中，这种实用的渐进法思路尽量在减少损失的情况下实现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目标⁶⁶。

不过，渐进式的全方位开放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开放度排名全球第 27 位⁶⁷，但是经济开放度排名全球第 136 位⁶⁸，在考虑法律规则、政府行政效率和开放市场等因素后，中国的开放度水平较低，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新型开放经济模式，在上海实行自贸区改革开放试点，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利率市场化等。

四、中国多维发展模式内在逻辑关系和独特竞争力

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开放和不断探索，中国发展模式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规定，混合经济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中央威权和地方分权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演进体现，要素规模与综合优势模式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全方位开放经济模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保障和大势所趋。这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相比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和竞争力，并能为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经济体提供借鉴。

⁶⁵Edison H.J.,& Klein M.W. (2004)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Survey and Synthesis," *IMF Staff Paper* 51 (2) , 220~256.

⁶⁶Naughton, B. 1995.*Growing out of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Lin,J.Y. 200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Lau, L.J., Y. Qian, and G. Roland. 2000. "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1): 120-143.

⁶⁷数据参见 <http://info.worldbank.org/etools/wti/1a.asp>

⁶⁸数据参见 <http://www.heritage.org/index/ranking>

这不禁值得我们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规定和如何演化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五个模式，和发达国家发展模式有何区别，是否是孤立的，其背后的演化逻辑体系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首先，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决定了混合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那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主导地位，这也为政府积极调控经济奠定了基础，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又需要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其大力发展对中国经济取得经济奇迹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从中央政府层面来讲，其国家治理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那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从地方政府的目标来讲，就是贯彻和实现中央政府的目标，而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直接任命和管理以及地方官员晋升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业绩考核制度，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达到了目标上的激励相容，这就是区域分权引致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内在机理，并由此带来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内源驱动力，也推动了改革进程，近 30 年来几乎所有得到中央政府出台的重要改革方案都是通过地方试验进行的⁶⁹；再次，适应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中国实行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种体现公有制性质的土地制度与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特殊背景相结合，在转型期，形成了快速发展的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模式；另外，在混合经济，区域分权模式下背景下，政府力量参与资源配置尤其对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和干预，加上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积累使得中国形成了多元要素供给与综合优势模式；最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决定了政府控制改革开放的节奏和内容，同改革方式一样，我国走了一条渐进式、试错式、有次序的全方位开放道路。

和西方国家相比，这显然不同于以英美为代表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常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在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独特的多维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混合经济模式，较好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制度结构，也为宏观调控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央威权与地方分权模式形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扶持之手”；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模式使得中国产业政策、发展规划与宏观调控结合，超越了西方的被动式宏观干预，为中国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多元要素供给与综合优势更不同于西方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产业替代式发展模式，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多重要素供给优势并存式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中国的渐进全方位开放经济模式使得中国并非与西方经济发

⁶⁹Xu, Chenggan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4): 1076-1151.

展脱节，而是将中国逐渐融入到世界发展体系中，汲取世界市场的养分，依靠其独特优势参与更大范围的市场竞争和国际分工。

相比之下，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模式普遍存在着经济过度金融化、制造业空心化、财富过度集中、节约劳力的技术进步与居民高福利高消费等一系列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得西方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缺陷，因此，中国不能完全模仿和照搬，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完善和丰富已形成的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很多亚洲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具有独特竞争力。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旦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使命，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体系嵌入到国家与社会大结构中形成新的经济体制范式与发展模式，可以超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阶段，可以缓冲市场经济的破坏。具有参照意义的是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为人口和国土面积大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印度早于中国实行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经济。但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经济增长驱动力、抵御世界经济冲击等方面都明显强于印度⁷⁰。印度曾被英国殖民数百年的历史导致印度经营阶层较早接触了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理念，导致印度独立后最终选择了西方的代议民主制政体，但是印度独立以来，事实上一直存在着多个彼此倾轧的政治集团，各地方党派数量多达 1000 多个，往往一个县、一个子种姓就能够形成一个政党，不同党派之间利益倾轧极为严重。因此，虽然表面上印度中央政府在财权、事权上的权力远大于下属各邦，但无论在中央政府内部，还是在各邦政府之间以及邦政府内部，各种利益冲突和政治斗争持续不断，严重制约了印度各级政府的决策效率，甚至相当一部分地区根本不遵从中央政府的号令⁷¹。

更具有比较意义的是与同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国俄罗斯的比较，前面内容中本文已多次提到，俄罗斯以英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本模式目标，国有企业在改革前期，实行激进改革，核心内容就是国有企业的是私有化。由于财产权重新界定需要时间，原有庞大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由于没有新的产权主体，导致企业运营资本投入的缺失，进而导致产量下降、几年持续下来，使得整个国民经济产业链断裂，生产秩序被打乱。可以说，正是国有企业没有起到对国民经济的稳定作用，进而导致私有化后的中小企业没

⁷⁰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两年中国 GDP 略低于 8%，印度 GDP 跌落幅度较大，至 3.89% 最低值，直到 2003 年才恢复 6% 以上；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保持 9% 以上的增长，印度跌落至 6% 以下。

⁷¹如印度东北地区的加尔格答曾是亚洲纺织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明显优势，但由于其地方政府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执政党理念存在严重分歧，导致过去 20 年内整个东北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缓慢，当地居民仍处在严重贫困之中。由于中央、州一级制定的基础设施投资规划往往由于会影响某个县、甚至某个村中大地主的利益而被迫延期，甚至停工。印度议会内部难以就很多基础设施项目开工建设达成一致意见的背后，同样反映了不同党派、不同地区乃至不同种姓和子种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

有形成有活力的新生力量，虽然有市场环境，但没有形成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区域自治又导致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掠夺之手的形成。由于中小企业没有充分发展，俄罗斯走向了经济结构单一、依赖能源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过早的对外经济自由化，又处于经常面临外部冲击的风险环境中。普京执政以后调整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政策，如重新国有化，强调中央威权治理，加大对地方官员经济业绩的考核，制定优惠招商引资政策，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俄罗斯经济在 2000 年以来有了很大起色，成为“金砖国家”。近年来面对经济的脆弱性又提出经济多元化和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目标，普京也多次表示向中国经济发展借鉴经验，可以说俄罗斯经济正在趋向于“北京共识”。这也表明中国对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影响力正在由周边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向更大范围的扩散，随着“一路一带”建设，亚洲自由贸易区的推进、基础设施的对外投资，经济体实现互联互通、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会越来越多影响到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形成较大的带动作用 and 示范作用，进而有可能引领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不同于常规市场经济模式的新路。

五、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模式调整和提升

中国独特经济发展模式所追求的目标是经济快速发展，其表现是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跃升，改革开放 30 多年实践证明，中国实现了这一目标，创造了奇迹。但是，要看到，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收入分配，环境生态等，同时，高投入，高污染，低附加值带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如前所述，这些问题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过多介入市场化的资源配置，纵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五个维度，都表现出政府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中的干预和影响力，特别是对生产要素配置的直接干预，虽然在经济转型期对经济发展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其弊端也逐渐显现，由此造成生产要素的使用与配置不当和扭曲，正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未来改革的重点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此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边界”，围绕这一核心，通过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方式，未来将打造和形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版。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阶段，也就是呈现“新常态”阶段。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和提升带来新机遇，新要求，新内容。与进入新常态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定位内容有：

第一，针对我国混合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动态的改革和调整，在现阶段进一步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缩小政府控制的资产

和国有企业规模比例，提高效率，通过资产运营保持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调控力。容许非公有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入若干垄断行业，放宽准入，降低门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各种实现途径和方式。深化土地改革，土地和财产权应得到明确定义和保护，特别是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交易，健全公开开放的土地流转市场。同时，确定政府调控经济的范围，增强提供经济安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以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建立高效、公平的保障社会体系。

第二，针对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模式问题，积极改变各级政府职能，限制政府介入经济权利，实行资源配置的“宪政治理，摒弃最求 GDP 考核业绩晋升机制，强调绿色 GDP。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税收结构、划分财权与事权和转移支付方面的改革，以期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区域分权模式。

第三，针对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问题，一是赋予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内涵，坚持走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结构优化升级，这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模式未来努力的方向。二是，强调“新四化”即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坚定不移地实施中国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战略，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并实现农村现代化。

第四，针对经济增长动力模式问题，要看到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结构的变化，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接近底限，依靠要素规模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要转到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此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大原创型创新的扶持、鼓励力度，努力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和任务。

第五，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未来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包括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一带一路”的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积极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大对外投资等政策的实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作者信息:

刘文革: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经济学博士后, “钱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Email: liuwenge1966@126.com。

通讯作者孙瑾: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访问学者, 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世界经济、宏观经济学。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中财大厦 1018 室, 邮编 100081。

Email: sunjin815@sina.com。Tel: 18611533500。